

支部生活

ZHIBU SHENGHUO



1

1959

中共南平地委“支部生活”編輯組編

“支部生活”第一期目录

毛主席論羣众路綫

編者的話..... (1)

建阳县是怎样发展新黨員的..... (22)

紅旗人民公社城关鉄厂在“火綫”上发展黨員
好处大..... (24)

把生活福利工作好好抓起来..... (25)

黃柏大队从解决福利問題入手开展整社 (28)

坚强的鋼鉄战士..... (31)

連松生赶牛..... (33)

打虎救人..... (35)

中共南平地委“支部生活”編輯組編

1959年1月30日

毛主席論羣众路綫

編者的話

“毛主席論羣众路綫”这篇文章，原来刊载于“好黨員”1958年第七期，文章的内容是摘录毛主席著作的有关章节，加以編列。我們认为，它可以作为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很好的学习文件，因此，把它轉載在“支部生活”的刊物上。

同志們，羣众路綫問題，对我們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來說，都是一个应当时刻注意的具有根本性质的重大問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党的羣众路綫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沒有羣众路綫，沒有羣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沒有羣众的革命积极性的高漲，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是不可能的。因此，公社的各级领导工作人員，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彻底执行羣众路綫。”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一贯倡导党在工作中的羣众路綫，并且贯穿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指导我們进行各项工作和巩固提高人民公社，仍然有着巨大作用。根据毛主席的英明論断，联系我們眼前的实际，加以钻研，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是完全必要的。

我們希望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認真地学习这篇文章。同时，可以将学习的心得，体会以及对文章編列的意見，及时地反映給“支部生活”編輯部。

坚决地信任人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被我们压倒。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摘自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

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万羣众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摘自1934年1月27日“關心羣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地主階級對於農民的殘酷的经济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摘自1939年12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摘自1945年4月24日“論聯合政府”）

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羣众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摘自1945年4月24日“論聯合政府”）

我們宣傳大會的路綫，就是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但這還不夠，還

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羣衆覺悟，甘心情願和我們一起奮鬥，去爭取勝利。要使全國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說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華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門南面有兩座大山擋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決心率領他的兒子們要用鋤頭挖去這兩座大山。有個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發笑，說是你們這樣干未免太愚公了，你們父子數人要挖掉這樣兩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說：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愚公批駁了智叟的錯誤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背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麼挖不平呢？

（摘自1945年6月11日“愚公移山”）

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羣衆，緊緊地和羣衆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與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

（摘自1947年12月25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摘自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要需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有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摘自1958年“介绍一个合作社”）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論行动，必須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必須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別人都不可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們的态度，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是亲近他們，团结他們，說服他們，鼓励他們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錯誤的人們，除了不可救藥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規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棄旧图新。共产党员應該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見卓識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見卓識，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

（摘自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共产党员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羣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領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須注意組織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間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

(摘自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見，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綱領”上有一条，規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說的。共产党员必須傾听党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机会。別人說得对的，我們應該欢迎，並要跟別人的长处学习；別人說得不对，也應該让别人說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釋。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結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結的反动的頑固派，这些人当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共緊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別人、壟断一切的权利。

(摘自1941年11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參議会的演說”)

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員相比較，無論何時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

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和非黨人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卻不懂得這個道理，看不起願意同我們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相反地，他們總是諄諄告誡我們，要密切聯繫羣眾，而不要脫離羣眾。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羣眾使自己孤立起來。相反地，中央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羣眾。而不要脫離羣眾。所以，一切脫離羣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里作怪。因為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分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線的實行，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個問題在黨內進行廣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們的幹部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同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摘自1942年2月1日“整頓黨的作風”）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羣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

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摘自1945年4月24日“論聯合政府”)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的纠正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摘自1956年“八大”开幕词)

……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尽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

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摘自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大众，才能正确的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个贫农大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民，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贫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摘自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大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

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摘自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一）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摘自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里所说的問題，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

主要領導幹部，除了老下中農和若干覺悟很高、確實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農仍然可以充當以外，一般應當由貧農（再說一遍，包括現在的貧農和原來是貧農的全部新下中農）來充當。我們對於福建省福安縣貧農領導的合作社和中農領導的合作社對於社會主義事業表示不同的態度這樣一種情況，不應當看作是個別的現象，它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摘自1956年出版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的“福安縣發生‘中農社’和‘貧農社’的教訓”的按語）

這是一個普遍的嚴重的問題。各級黨委和派到農村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們，對於這個問題都應當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領導機關必須建立現有貧農和新下中農在領導機關中的優勢，而以老下中農和新老兩部分上中農作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黨的政策實現貧農和中農的團結，鞏固合作社，發展生產，正確地完成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這個條件，中農和貧農就不能團結，合作社就不能鞏固，生產就不能發展，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能實現。許多同志不懂這個道理。他們認為建立貧農優勢的問題，在土地改革時期是必要的，因為那時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貧農，還沒有上升為中農，而中農對於土地改革是動搖的，因此那時確有建立貧農優勢的必要。現在是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期，過去的貧農大部分已經上升為新中農，而老中農的生產資料又多，沒有老中農參加就不能解決合作社生產資料缺乏的問題。因此，這些同志認為，現在不應當提出依靠貧農或者建立貧農優勢的口號，認為這種口號會不利於合作化。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如果要用社會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制度去徹底地改造

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份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

农和下中农組織的合作社已經証明了。我們也不是說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覺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須树立貧农（再說一遍：包括現在的貧农和原来是貧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內，他們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優勢。在組織成份方面，他們应占三份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份之一左右。在合作社指导方針方面，必須实行貧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損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須建立貧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要排挤貧农和損害貧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經驗，充分地告訴我們：建立貧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險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綫。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貧农的优势领导。結果，貧农揚眉吐气，中农也心悅誠服。

（摘自1956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長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轉变为貧农占优势的”按語）

这个地方的党組織，在合作化的問題上，从来沒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貧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說：“穷光蛋想办合作哩，沒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

大多数已无雇工，他們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們占农村人口的百份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誰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爭夺羣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們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后面站着共产党，他們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輿論問題。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問題。几十年以来，誰人看見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評，它就会使許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貸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傳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会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会。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經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們的許多地